

# 唐代女道士的多才多艺与精彩人生

薛晓倩

唐代最少有 28 位公主度为女道士,此外还有大量的妃嫔宫女,以往主要依靠《唐书·公主传》,现在可以获得其他史料如十篇墓志铭,大部分也是新出土的,如金仙公主墓志、玉真公主二儿媳的墓志等,玉真公主与其二儿媳都是女道士。公主们前后度为女道士,却没有出家做尼姑的,很容易想到的一点是唐王室对老子和道教的大力推崇。然而,当我们看到这么多墓志铭,发现每个人都有其特殊、复杂的原因:太平、金仙、玉真、万安这几位公主,开始都是为皇室祖先追福而度为女道士。

近日,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香港孔子学院院长贾晋华女士做客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并作题为“如何研究性别与中国宗教的关系”的讲座。1981年,女性主义批评在美国大学中获得学术承认,此后以女性文学批评为主的女性主义批评逐渐扩展到人文社会学科各个领域,不久女性批评的视角从研究女性拓展为研究性别和性的建构,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研究则逐渐转向性别批评和性别研究,而在宗教研究中引入性别研究的起步和发展都相对较迟。2004年,乌苏娜·金在《导言:性别批评在宗教研究中的转向》中提出:“一方面,多数当代性别研究,不管是人类学、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的性别研究,极其缺乏宗教视域,另一方面,宗教研究也缺乏性别关系的思考。”2009年,苏珊·卡莱夫《新视野:宗教与性别批评的卷入》也提到

了学者从事宗教研究时缺乏性别意识的问题。

贾晋华教授此番讲座围绕唐代女道士研究而展开。早在 2011 年的时候,澳门大学与莱斯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加州大学、台湾大学等合办了“女性、性别与中国宗教”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性别化中国宗教:主体、身份及身体》(*Gendering Chinese Religion: Subject, Identity, and Body*)由贾晋华与姚平、康笑菲三位教授合编并于 2014 年出版。这一论文集分设专题,包含中国古代到当代的各个阶段,被认为确立了性别与中国宗教关系研究的次领域,在西方不少大学被作为教材而使用。此外,贾晋华向大家介绍了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一本书——《性别、权利和才华:中国唐代女道士的生命历程》(*Gender, Power, and Talent: The Journey of Daoist Priestesses in Tang*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这部著作将性别批评、宗教研究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又加上详实的文献考证,对唐代女道士做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

总的来说,学界对于唐代女道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李季兰和鱼玄机的研究,关于她们的研究也有很多误区,比如把她们称为“娼妓”,关于这一点,贾老师在后面的论述中有详细分析;另一个是杜光庭《墉城集仙录》,因其中可以辑录出十几篇唐代女道士的传记,故而成为研究唐代女道士的传统资料。贾晋华指出,这些传记并不可信,比如《墉城集仙录》中刻画的圣女王奉仙,在历史上



《奉道科戒》里的女冠图,左为大洞女官,是女冠中的最高等级,右为平常女冠。

是一个导致数百人死亡的女巫。因此,她在研究中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女道士自己的诗歌、书法和理论作品,传世史书、诗文笔记、地方志和寺观志等,以及传世和新出土的 40 篇女道士墓志铭;基本上不用《墉城集仙录》。

新方法与新资料可以用来提出和解决新的问题。贾晋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唐代女道士作为性别化的“宗教-社会群体”是怎样形成的?唐代的天子诏令或士大夫上书

中都会把道士、女冠、僧、尼并称为四个群体,女道士也被称为“女官”、“女冠”。根据开元间的数据统计,唐代的女道观占了全国道观总数的三分之一,唐代女道士的数量之多可以想见。对应《奉道科戒》中的女冠图与唐人诗歌中的描绘,唐朝女冠的服饰造型保留了女性美的特征,特别是跟尼姑相比,唐代的女道士不用剃头,还穿着漂亮的衣服,

(下转 5 版) →

← (上接 3 版)

众锁进医院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含蓄的社会批判让他的作品往往带有怀疑主义色彩。阿西斯笔下的一个人物坦言:“这或许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我们别无选择。如果你没有下决心要改变它,那就只能承受这一切,在这个社会里照常生活。”《金卡斯·博尔巴》的英译者格里高利·拉巴萨(Gregory Rabassa)将它视为阿西斯反理想主义的宣言。莫泽也认为,这说明了阿西斯选择去接受这个既成的社会,而不是去追逐它理想中的样子。而拉里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阿西斯之所以要展示那些甘心屈服于不合理社会的现代人,恰恰是要揭露他们的虚伪。

那么阿西斯能否算作“现实主义”作家呢?虽然许多简介将“现实主义作家”冠于阿



以巴西社会学家吉尔贝托·弗雷雷 1933 年出版的《主与仆》为首,一系列著述使得混血身份在巴西摆脱了污名。随着这一思潮的兴起,拥有黑人血统的阿西斯成为了整个国家的光荣。

图片来自 [www.oferraodohumor.com](http://www.oferraodohumor.com)

西斯的名字之上,但阿西斯专家、《唐·卡斯穆罗》的英译者约翰·格莱登(John Gledson)却将《阿西斯的现实主义骗

局》(*The Deceptive Realism of Machado de Assis*, 1984)当作专著标题,莫泽与帕鲁尔也认为阿西斯具有“反现实主

义”的倾向。与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相比,自然描写是缺席的,在他的书中看不到巴西的壮丽风光和迷人天候,对莫里哀与歌德的征引却俯拾即是。一位朋友曾建议他在小说里多插入一些自然描写,但他写了不到十行就厌倦了。他这样回复那位朋友:“我对自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人。”

阿西斯向世人证明,比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更能够孕育世界主义。这个足不出户的人通过阅读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而他对欧洲文学的信手拈来,更是改变了世界对巴西“原始而热情”的刻板印象。尽管巴西人努力了几个世纪来营造祖国的“异域情调”,阿西斯的博学

与深刻则证明,巴西始终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马查多·德·阿西斯告诉我们,四海之内的人间喜剧并没有什么不同,在人与社

会的冲突中,社会往往是最终赢家。而他的作品和人生也证明了,社会的胜利没有看上去那样令人窒息。外在的顺从或许恰好可以保护内在的自由。也许正如那位精神病医生所说,看起来最顺从的人,也最疯狂。

(本文编译和成稿参考 Benjamin Moser 于 2018 年 7 月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He's One of Brazil's Greatest Writers. Why Isn't Machado de Assis More Widely Read?*”、Parul Sehgal 于 2018 年 6 月 6 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A Master Storyteller From 19th-Century Brazil, Heir to the Greats and Entirely Sui Generis*”以及 Larry Rohter 于 2008 年 9 月 12 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After a Century, a Literary Reputation Finally Blooms*”)